

辩证理解列宁与托洛茨基对农民革命作用观点的分歧

——季诺维也夫批判“不断革命论”的焦点之一

吕佳翼

(浙江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23)

摘要:围绕俄国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讨论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通过具体分析列宁批评托洛茨基的具体语境与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误读,以及列宁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作用之观点的前后转变,澄清了托洛茨基的农民观,使得列宁与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渐趋一致。

关键词: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农民问题

中图分类号:A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6)05-0036-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07

A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Divergence Between Lenin and Trotsky in Peasant's Revolutionary Role: Zinoviev's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LV Jia-yi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discuss Zinoviev's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nction of peasants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crete context of Lenin's criticism of Trotsky, Zinoviev's misreading of Trotsky and Lenin's change in his opinion on the role of peasants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us Trotsky's opinions on the peasants are clarified and so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Lenin and Trotsky shared similar opinions on the role of peasants in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 Zinoviev; Trotsky; theory of uninterrupted revolution; peasant problem

一、引言

季诺维也夫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虽名为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和阐释,实则用大半篇幅批判托洛茨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以服务于当时“三驾马车”(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权力斗争。虽然后来季诺维也夫也被斯大林打倒,他对列宁主义的阐释随之也无以立足,但他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歪

曲性批判却奠定了后世误解和曲解这一问题的理论张本。然而对“不断革命论”的误解和歪曲,也是对列宁与托洛茨基关系的误解和歪曲,从而也将导致对列宁主义的误解和歪曲,因此澄清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全面讨论季诺维也夫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论述,因此主要围绕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问题展开论述。

基金项目: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710039);2015年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社科预研基金(GZ152105054800)

作者简介:吕佳翼(1986—),男,江苏无锡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

“完全不懂得农民的意义”^{[1]25}，不懂得“在这样的国家里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基本盟友”^{[1]67}，对托洛茨基来说“在革命中实际上并不存在农民”^{[1]118}，认为“无产阶级和农民在革命运动中不可能建立‘联盟’”^{[1]136}，等等，是季诺维也夫在其书中批判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重点之一，散布在书中各处。由于对这一问题误解较深，值得专门一论。

实际上，在写于1906年的《总结与展望》一书中，托洛茨基所提出的就是得到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而且应当吸收农民领袖参加政府。托洛茨基指出：“这决不排除非无产阶级的社会集团的革命代表参加政府。他们能够、也应该参加政府；健全的政策会迫使无产阶级吸收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有影响的领袖来参加政府。”^{[2]35}在写于1929年的《不断革命》一书的最后一章托洛茨基总结了“不断革命论”的十四个基本论点，其中也指出解决民主革命问题的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为基础”^{[3]223}。因此，托洛茨基不重视农民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问题。

二、列宁前期对托洛茨基的一个批评

当然，列宁对这个问题也确曾有过类似的批评，这段批评自季诺维也夫起，在对托洛茨基“否定农民”的批判中被广为引用至今。列宁这段话写于1915年11月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中：“托洛茨基的独创性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借用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据他说，农民已经分化了，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了，他们能起的革命作用愈来愈小了；在俄国不可能进行‘民族’革命，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不是使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真是一个‘玩弄字眼’——玩弄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有趣的例子！如果说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那就是说俄国已经直接面临社会主义革命！！那就是说‘没收地主土地’这个口号（托洛

茨基继1912年一月代表会议之后在1915年又加以重复的口号）是不正确的，那就是说不应该讲‘革命工人’政府，而应该讲‘工人社会主义’政府！！托洛茨基又说，无产阶级的坚决性能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带动起来（第217号）。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混乱到何等程度！！托洛茨基也不想一想：如果无产阶级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①

列宁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批评托洛茨基跳过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并因此对农民的作用作出不正确的估计，即所谓“‘否定’农民作用”。然而，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甚至于帕尔乌斯的“工人政府”论）并没有“跳过”民主革命阶段——他只是认为完成民主革命任务须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否定’农民作用”^②。因此，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这段批评应当是存在一定误解的——这在当时列宁尚未读过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主要著作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托洛茨基后来（即列宁去世后别人以列宁的话攻击他的时候，列宁在世时当然不需要这种自我辩护）为自己的辩护中指出：“列宁对于我‘否定’农民而提出的这种责难，没有寄往‘正确的地址’，实际上他指的是真正跳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布哈林和拉狄克”^{[3]152}。实际上，列宁这段批评的话中所引的托洛茨基的原话所表达的真实意思是：“只有无产阶级的独立的和勇敢的政策才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3]15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意思。但当时，列宁对“无产阶级专政——民主革命”这一“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还不是十分了解的，他基本上还是在以“工农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模式在套托洛茨基的思想。所以，当他看到托洛茨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97—98页。另，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68—69页。

② 参阅吕佳翼：《异化批判与革命理论——当代“第四国际”思潮论集》之《编译者序》，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第15—21页。

基既谈论帝国主义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从而要求确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又谈论无产阶级应当和能够“把‘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也带动起来”时,就感到“托洛茨基混乱到何等程度”。如果了解“不断革命论”的基本思想,其实这里并无混乱,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得到农民运动支持的无产阶级专政或者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此之下进行民主革命。

但列宁对托洛茨基的批评中也隐含着此时真正的分歧,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列宁对托洛茨基的误读。上面引用的列宁那段话的最后一句透露了这种分歧:“如果无产阶级能带动农村非无产阶级群众去没收地主土地,推翻君主制度,那也就是完成俄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那也就是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列宁不承认这是无产阶级专政,而认为是工农民主专政。因此,这个真正的分歧就是农民是否该与、能与无产阶级共有对革命和专政的领导权问题。正如托洛茨基所指出:“我同列宁所进行的论战,实质上是争论农民在革命中独立的可能性(以及独立的程度),特别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政党的可能性。在这场论战中,我责备列宁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独立作用。列宁则责备我低估了农民的革命作用。”^{[3]153}托洛茨基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没有独立性,不是跟着无产阶级跑就是跟着资产阶级跑,因此不会有独立的农民政党,不会有独立的农民专政。同时也不会有工农共同的政党和专政,因为在工农的联盟中,只能使农民接受无产阶级领导即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有使所谓的工农党为资产阶级所利用的危险。这后一点在中国国民革命的国民党(这个当时所谓的工农党)中变成了现实。但当时,列宁并没有这种顾虑,因此从这点来说,说托洛茨基对农民革命作用的估计低于列宁,也是事实;但这也只是在与列宁(而且是前期)的比较中而言,并不能一般化地说托洛茨基低估或轻视农民。

此外,与上述分歧相关,托洛茨基与列宁此时对农民的不同估价(或者说托洛茨基比列宁低估农民)还表现在托洛茨基对农民在革命运动中的分化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一点其实是对上面所说的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的逻辑延伸。虽然托洛茨基非常强调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专政

是得到农民支持的、建立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指出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农民必将发生分化,从而导致农民的不同部分或者跟随无产阶级,或者站到资产阶级一边与无产阶级对立,同时也就必然导致这农民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对立。正如托洛茨基在写于 1960 年的《总结与展望》中所说:“执政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将一天天地加深,其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和民族之间的革命关系将会破裂,农民的阶级分化会以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农民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对抗也将随着工人政府政策的明确化和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2]40}这段话说明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不是一经确定就固定不变的。大体说来,在民主革命初期无产阶级会与大多数农民甚至全体农民一致,随着民主革命发展,农民会出现分化,无产阶级当然就会对分化的农民采取不同的政策,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种分化和对抗当然会更明确并成为主要矛盾,这是一个随着“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而逐渐增长”的过程。托洛茨基举例指出:“消灭等级制的农奴制,将得到作为纳税等级的全体农民的支持。按收入征收的累进税也会得到大多数农民的支持。但是为了保护农业无产阶级而实行的法律措施,不仅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情,而且还会受到少数农民的积极反对。”^{[2]40}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以至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后农民的逐渐分化。

三、季诺维也夫的两段误读

由于上面所引托洛茨基的那段话中提到民族革命的问题,因此有必要澄清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的另一个批评,即托洛茨基不懂得或贬低民族革命^{[1]65}。的确,还在 1917 年之前,托洛茨基就比列宁更早地强调国际主义、批判民族主义,这与他们的不同革命观点有关。列宁在 1917 年之前,还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在工农民主专政的框架下解决民主革命任务,也就是说还是把它视为一种民族革命。但托洛茨基早就强调确立无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无间隔或阶段之分,因此必然提前具备一种无产阶级的国际视域。因为当无产阶级与农民愈来愈分化,也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也将愈来愈明确”时,实际上革命就愈加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因而也就愈加要在世界舞

台上解决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在世界舞台上展开,这一点当时乃是无需争论的常识)。

实际上,民族内部农民的分化过程与革命的国际性愈益突出的过程是一种一体两面、此消彼长的关系。也就是说,农民愈分化,革命愈需要国际性的支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洛茨基在1915年的时候对于革命前途提出了“民族主义方针还是国际主义方针”^①的问题,他说:“在这十年中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发展是沿着继续降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可能起的革命作用,继续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权和生产作用的道路进行的。如果说1905年未能完成‘民族’革命,那末历史甚至不可能提出第二次民族革命,即联合‘整个民族’去反对旧制度的革命。”^②让季诺维也夫分外不解和恼火的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全部发展是沿着继续降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可能起的革命作用”?其实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随着革命发展而必然出现的农民分化,并正因为此分化而需要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作用。又为什么说“不可能提出第二次民族革命,即联合‘整个民族’去反对旧制度的革命”?因为托洛茨基不认为可以在工农民主专政的框架下解决民主革命任务,而必须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一旦如此,革命的民族性会愈益被突破,国际性会愈益突出。总之,不理解托洛茨基的整个“不断革命论”,就无法正确理解托洛茨基对民族革命的这种态度。

季诺维也夫在本书的另一处又引了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以示托洛茨基轻视农民、破坏工农联盟。这是写于1922年的《1905年》一书的俄文版序言中的一段话:“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先锋队正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胜利,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在这种情形下,它不仅会和那些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初期支持过它的一切资产阶级集团发生敌对的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

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③其实这段话的意思与上面我们所引的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展望》中的那段话的意思几乎一致,读来也颇为眼熟,但似乎还是有微妙的差异。《总结与展望》中的那段话说无产阶级与农民的冲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是随着“由一般民主政策变为阶级政策”,也就是说随着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逐渐明确和发展的。而后面这段话则说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就要与农民发生冲突,这样一来按照托洛茨基的意思,似乎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革命初期,无产阶级就要与农民发生全面冲突了。大概也正是这个原因,季诺维也夫宁可引后面这段话,因为它更具有“刺眼”的效果。但我们需注意,托洛茨基后面这段话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在它统治的初期”,并不是说民主革命的初期。因为到托洛茨基写作本文的1922年,俄国革命的历史已表明,在俄国民主革命的初期尚未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或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之后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它的“统治”的。因此,这里托洛茨基所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还在它统治的初期”,是指已经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期。这样来看,这段话的意思与上面那段话的意思就完全一致了,即:农民的分化或无产阶级与分化农民的冲突,是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而逐渐发展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农民的分化或无产阶级与分化农民的冲突,不仅是托洛茨基的观点,也是列宁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不过后来苏俄在特殊情况下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才对这一点有所改变。但这种改变在当时的列宁等人看来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改变上述基本原则的正确性。因此,列宁前期与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主要就集中在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上。

① 托洛茨基:《军事溃败和政治前途》,转引自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② 托洛茨基:《战争与革命》第1卷,第255—256页。转引自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③ 托洛茨基:《〈1905年〉第一版序言》,http://marxists.anu.edu.au/chinese/Trotsky/1905book/00.htm。另可参看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郑异凡、郑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262页。

四、后期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观点渐趋一致

那么,列宁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即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否已经开始分化;还是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尚与农民整体携手而行?前面已经指出,前期列宁是持后者的观点,而与托洛茨基有所不同。但在经过了 1917 年的四月“转向”之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远未完成,列宁已经关注到农民的分化,比如他指出“贫雇农和农民业主之间发生着更深刻的分裂”^①,要求“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4]14},并且要求“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分子同小资产阶级分子分离”,对他们“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4]14},等等。此后,《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对农民分化问题的论述可以说与托洛茨基如出一辙:“农民由于自己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必然是或者跟工人走,或者跟资产阶级走。中间道路是没有的。”^{[4]827}由此可见:(1)在民主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农民的分化是实,这种分化不是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才出现的;(2)列宁明确认识到这一点,并对他之前的农民论作出相应的修正。这样就与上面所说的托洛茨基的观点相当接近了。

当然,列宁在此以后也不是没有说过与此有所出入的话,如为季诺维也夫所征引的、列宁在写于 1918 年 10 至 11 月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所说的话:“资产阶级革命由我们进行到底了。农民整个说来是跟着我们走的。他们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对抗,一时还不会显现出来。苏维埃联合了全体农民。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显露出来”^{[4]659};“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4]657}。这两段话,列宁似乎完全回到了“二月革命”之前对于农民问题的老观点,即在整個民主革命阶段,农民毫无分化,农民是完全稳定的,等等。这与上面所引的 1917 年 4 月所写的那些文件中的话有明显出入。但值得注意的是,即

使在这篇文章中,列宁也绝没有认为“二月革命”以后就完成了民主革命,相反,正是在这里,列宁指出民主革命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的^{[4]659}。

那么,如何理解列宁在农民问题上的矛盾呢?如果细读上下文,把其中断裂的意思打通,就会发现列宁刚好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即在民主革命还没完成或者说还在进行的过程中,农民就已发生了分化。何以这么说呢?在该文前后相衔接的几页中,列宁指出:(1)1917 年 4 月后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4]657};(2)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后,农民就分化了,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财主、富农、投机者”; (3)民主革命任务是在“十月革命”以后若干时间内才完成的^{[4]659}。根据这三层意思,运用形式逻辑的规律,就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1917 年 4 月后,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开始发生某种重合;第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十月革命”前)也即民主革命进行过程中,农民就已分化。

那么,如果进一步追问,在这里为何出现列宁在表面上表达的意思,与实际上隐含的意思有出入呢?列宁倒不是要故意这么做,故意把真实的意思隐藏起来。笔者以为,这与列宁对考茨基争辩、批判的特定语境有关。考茨基是反对“十月革命”的,他认为俄国革命应当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工人与农民的冲突。列宁为了理清“这个被考茨基搅乱了的问题”^{[4]657}就用几句比较简明的话解释说:我们先是与全体农民一同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我们没有跳跃阶段,只是当着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后,才发生了农民的分化以及无产阶级与分化农民的冲突。这么说确实显得条理比较清楚,有利于反驳考茨基的“混乱”。相反地,假如列宁果真按“二月革命”后实际进程中的“不断革命论”逻辑与考茨基争论,对于考茨基本就混乱的逻辑来说只会平添混乱。

因此,总体来说,经过“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这一阶段以后,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季诺维也夫所开启的那种误解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对农民的政策有所变化,但(下转第 99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8 页。

高的背景下,公众期望政府能够对其提出的诉求做出及时的积极反馈,并努力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中显现、暴露出大量复杂的矛盾,通常这些矛盾具有很强的社会敏感性,如果处理不好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团结。政府作为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拖延甚至漠视公众和社会组织提出的要求,从而导致政府预期和行为的短视化,这对政府现有的社会服务模式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因此,创新政府服务模式、构建回应型政府是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巩固执政基础的必然之举。

现代公共行政学认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于社会,回应、满足和实现公民的正当要求,负责任地行使权力是政府的应有职责。斯塔林提出,政府责任所涵盖的基本价值之一就是“回应性”^[13]。回应型政府的塑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权力监督体系,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制等措施,规定如何回应,怎么回应,以及如何实施回应问责等关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完善回应载体实现服务的针对性、具体性。除了继续改善传统回应载体,如报纸、新闻、广播等,还要积极稳妥地利用现代回应载体,如互联网、手机网络等,以实现回应效果的提升。

总之,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变化的产物。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汲取社会运动规律的思想,我们才能更好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来社会中,完善的治理机

制将大大改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使公共权力完全回归社会,形成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公民良性互动的局面,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2.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
- [3] 青木昌彦.市场的作用 国家的作用[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74.
- [4]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03.
-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89.
- [8]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台北:聊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212.
- [9] 张康之.社会治理的历史叙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6.
- [10] 纪霖.公共性与公民观[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64.
- [11] 埃利希·弗罗姆.逃避自由[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公司,1941:10.
- [12] 贾西津.转型时期的行业协会:角色、功能与管理体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06.
- [13] 斯塔林.公共部门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6.

(责任编辑:李秀荣)

(上接第40页)那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另外一个问题了,那是在特殊情况下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出的某种必要的修正。但即便在这一过程中,列宁是这一修正的主要推动者,托洛茨基也是完全支持的,至于在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为何又与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在农民问题上发生冲突,则还需另文讨论和澄清。总之,忽视具体的历史语境笼统地说托洛茨基轻视农民,无视列宁在这一问题上的前后转变,笼统地说列宁与托洛茨基在农民问题上的对立是错误的。至于把这一对立夸大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则完全是服务于权力斗争的理论迷障了。

参考文献:

- [1] 季诺维也夫.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M].郑异凡,郑桥,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 [2] 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M]//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蔡汉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 [3] 托洛茨基.不断革命[M]//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柴金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
- [4]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夏玉玲)